

【中國古典學 第二卷】

楊向奎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

吳銳 編

吉林大學出版社

中國古典學
第二卷
楊向奎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

吳 銳 編

吉林大學出版社

China Antiqua

Vol.2

Anthology of Essays in Commemoration of Prof.YANG Xiangkui's 100-year Birthday

Edited by WU Rui

Jilin University Press

November 2009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古典学. 第2卷, 杨向奎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/ 吴锐编.
-长春: 吉林大学出版社, 2009.10
ISBN 978-7-5601-5037-6
I. ①中… II. ①吴… III. ①传统文化—中国②杨向奎
(1910~2000)—纪念文集 IV. ①G12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194175号

书 名: 中国古典学(第二卷)·杨向奎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
作 者: 吴 锐 编

责任编辑、责任校对: 刘子贵

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开本: 787×1092毫米 1/16

印张: 39.375

ISBN 978-7-5601-5037-6

字数: 700千字

封面设计: 程岩峰

长春日升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2009年11月第1版

2009年11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150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社址: 长春市明德路421号 邮编: 130021

发行部电话: 0431-88499826

网址: <http://www.jlup.com.cn>

E-mail: jlup@mail.jlu.edu.cn

序

吳 銳*

一、本書緣起

楊向奎先生，字拱宸，1910年1月10日出生於河北豐潤縣（今唐山市豐潤區）豐登塢鎮楊家莊，1929年考入北京大學預科，1931年轉入歷史系，受教於顧頡剛、傅斯年、錢穆諸先生，也選修過錢玄同、胡適、熊十力等前輩的課程，其間與同學孫以悌、高去尋、胡厚宣、張政烺、王樹民成立讀書會——“潛社”，出版“潛社史學論叢”。1935年畢業留本校文科研究所任助理，整理明清檔案。1936年赴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留學，跟加騰繁教授（KATō Shigeshi, 1880—1946）學習隋唐史，1937年“七七事變”時回國。1938年任甘肅學院講師、教授。1940年到成都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任職。1941年任城固西北聯合大學歷史系副教授。1943年秋，任四川三臺縣東北大學歷史系教授。1946—1956年任青島山東大學教授及中文歷史兩系主任、文學院院長，創辦《文史哲》。1956年調到北京，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二所（現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）研究員、清史研究室主任，兼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、博士生導師。先生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五、六屆全國委員會委員，2000年7月23日在北京去世，新華社、《人民日報》、《光明日報》、《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》等報刊譽之為“史學界一代宗師”云。

1994年、1998年，海內外學術界兩次為楊先生祝壽，出版了祝壽文集。2003年又出版了紀念楊先生去世三周年的文集。2007年，經唐山市民政局註冊，楊向奎研究會成立，唐山市師範學院院長范永勝教授任會長。研究會編輯印刷《楊向奎研究會會刊》，自2007年6月10日創刊，已經出版至第三期。刊名系楊先生生前好友任繼愈先生題寫^①。

* 吳銳，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。

① 為推動楊向奎先生全集早日出版，我曾多次面見任先生。任先生以93歲高齡於2009年7月11日歸道山，謹此哀悼。

2010年1月10日是先生百年冥誕，作為追隨楊先生六年的助手，我很想編書紀念。楊先生原配所生長女楊永賢老大姐態度非常堅決，堅持要編。作為唐山市中級法院的離休幹部，她說大家集衆人之力用自己的文章紀念楊先生，與楊先生的知識產權無關，任何人無權指責。這樣我才在小範圍內發約稿信^①，得到海內外學者積極響應，編委會收到來自大陸、臺灣、美國三地的論文約四十篇，采納三十三篇，全部是原創，首次發表。經我重新排版，格式、字體仍不太統一，也祇好遷就了。我就《中國古典學》對應的英文譯名請教美國吳光明前輩，他徵求David Schenker教授的意見，David建議採用採用拉丁化的Antiqua譯“古典學”，我很喜歡學究氣十足的Antiqua，於是就用China Antiqua對應《中國古典學》。我非常感謝光明前輩和David的幫助。

全書分兩大主題：（一）中國古典的解釋。涵蓋方法論及文史哲等古典學領域。（二）對楊向奎先生的回憶以及對楊先生家鄉唐山市地方文化的研究。本書適合對中國傳統文化有興趣者研讀。特別是經學研究，大陸因為心術不正（過去是批現在是捧），要落後臺灣幾十年，即使從本書臺灣青年學子的論文，也可看出差距。

二、續論豐潤楊派的得失

楊先生的學問，我認為已經自成一派，本人已有論述^②。按照唐朝疑古史學家劉知幾才、學、識三個高標準，楊先生的“識”可以與他同時代非馬克思主義陣營的顧頡剛（1893—1980）、陳寅恪（1890—1969）和馬克思主義陣營的郭沫若（1892—1978）諸大師比肩，而才、學則比他們遜色。其中陳寅恪先生，楊先生和他祇有一面之交，而顧頡剛是楊先生追隨50年之久的恩師，郭沫若當過中國科學院院長，是楊先生的上司，且有私交。

郭沫若天才縱橫，不研究古文字則難以理解他的偉大。侯外廬先生（1903—1987）深受郭沫若的影響，親手翻譯過《資本論》，對馬克思主義經典的掌握似乎超過了郭沫若。郭老一些引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話可以刪去而不影響文義，同樣是侯外廬先生引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話，則恰到好處，刪去則有釜底抽薪之虞。1943年出版的侯外廬《中國古典社會史論》（後來改名《中國古代社會史論》），其深邃、細密似乎都超過了郭沫若《中國古代社會研究》，達到

^① 我特別避免在北京、山東等楊先生熟人集中的地方約稿，以免被指責找楊先生的熟人辦事。

^② 吳銳《百年樹人懷拱辰——豐潤楊先生學案小引》，《古史考》第八卷，海南出版社，2003年；吳銳《豐潤楊向奎學派的得與失》，載唐山市《楊向奎研究會會刊》創刊號，2007年6月10日。

了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最高峰，那些鄙視馬克思主義史學的人實在有必要細讀此書。

馬克思主義史學強調人是社會中的人，不免將人抽象化，因此不太關心創造歷史的這些人的民族屬性。而非馬克思主義學派一上手就研究族系，成就最大的當然是古史辨學派。

1941年，離《古史辨》第一冊出版已經15年。古史辨派幹將童書業先生（1908—1968）為《古史辨》第七冊作序，總結“《古史辨》發展到了現階段的大略結論”，概括如下：

“三皇”“五帝”的名稱系統和史迹，大部分是後人有意或無意假造或訛傳的。“皇”“帝”的名號本屬於天神，“三”“五”的數字乃是一種幼稚的數學的範疇，“三皇”“五帝”和古代哲學與神話是有密切的聯系的。大約：盤古，天皇，地皇，泰皇（或人皇），決無其人；燧人，有巢，伏羲，神農，也至多是些社會進化的符號。至於黃帝，顓頊，帝嚳，堯，舜，鯀，禹等，確實有無其人雖不可知，但他們的身上附有很多的神話，却是事實。把這些神話傳說剝去，他們的真相也就所剩無幾了。至啓以下的夏史，神話傳說的成分也是很重，但比較接近於歷史了。到商以後，才有真實的歷史可考。總而言之，夏以前的古史十分之七八是與神話傳說打成一片的，它的可信的成分貧薄到了極點！

《古史辨》出到第七冊就劃上了句號。1949年以後，顧頤剛先生仍然以其旺盛的學術生命力探討三皇五帝問題：

1923年，我和錢玄同先生討論中國古史問題，主張推翻三皇五帝及禹的歷史地位，回復他們的神話地位。

現在認識，三皇五帝或是原始社會裏的氏族祖先，或是奴隸社會裏的知識界用了理性推測出來的古帝王，而是在封建社會裏排列成為凝固的系統的^①。

針對吳世昌來書謂“古代人物，不論稍後變為神話或傳說人物與否，其原必為歷史人物”，顧先生並不同意：

如三皇與五帝相比，則五帝容有若干歷史真實性，而三皇則必然為後起之神話；以五帝自相比，則少昊、帝嚳、堯、舜容有若干歷史真實性，而黃帝、炎帝則為由神化人之人物，以尚有青帝、白帝、黑帝之但為神而不化人者在也^②。

據《國語·晉語四》：“黃帝之子二十五人，其同姓者二人而已；唯青陽與夷鼓皆為己姓。……其同生而异姓者，四母之子別為十二姓。凡黃帝之子，二十五

^① 顧頤編：《顧頤剛讀書筆記》第十卷，臺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，1990年，第7736頁。

^② 顧頤編：《顧頤剛讀書筆記》第九卷（上），第6909頁。

宗，其得姓者十四人，爲十二姓。姬、酉、祁、己、滕、箴、任、荀、僖、姑、儁、依是也。唯青陽與蒼林氏同於黃帝，故皆爲姬姓。”黃帝的原型是什麼？顧先生認爲它本是卜居昆侖之上帝，由大神變爲人間之共祖。藉傳播之力，爲十二姓之共祖^①。可見說中國人是黃帝子孫之荒唐。

2000年，本人修訂《古史辨》一至七冊，特意於第七冊收入新發現的顧先生爲《古史辨》第七冊寫的序，其中有：

常常有人問我，“《古史辨》要出到幾冊才完？”我答道：“《古史辨》是出不完的，祇要中國古史方面有問題在討論，就有續出《古史辨》的可能。《古史辨》不是一人的書，也不是一世的書，而是一種問題的討論的記錄。你們把這一種書看作不定期的雜誌罷！”

果然，顧頤剛先生1980年去世後，他的學生劉起鈞先生（1917—）爲《中國大百科全書·中國歷史卷》寫“黃帝”詞條，表述如下：

黃帝是我國古史傳說時期最早的一位宗祖神，華夏族形成後公認他爲全族的始祖，實際是我國古代生息在黃河上游西北廣大地區原始的部落（當即是早先的氐羌族）中，有一支住在姬水一帶（見《晉語》，即東起渭水西迄湟水之間今陝甘青地境的古齊家文化區域），因率先進入青銅時代，創造了較先進文化，因而形成爲先進的黃帝族。他們的族名就是由於有一位杰出的始祖黃帝來的。他們族中一支進入今山西省南部創造了夏文化，因而稱夏族，他們進入中原建立了我國第一個王朝夏代。再傳下來，就是也生息在陝西境的姬姓的周族，他們推翻了東方鳥夷族建立的第二個王朝商代，而建立了第三個王朝周代。追念自己的遠祖黃帝族，就用自己的姓追呼黃帝族也爲姬姓^②。〔鳥夷，原書誤爲“烏夷”。〕

劉先生使用“追呼”一詞，可謂慎之又慎。因爲黃帝時期肯定沒有文字，沒有姓氏不可知。

與其他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不同，楊先生大力研究族系。楊先生十分重視理論（尤其是唯物史觀）和古文字學，對郭沫若推崇備至^③。郭沫若先生在考釋《獻侯鼎》銘文末尾的𠄎時，就引用《國語·周語下》“我姬氏出自天鼃”之句，釋爲“天鼃”，認爲天鼃即軒轅，但沒有進一步論證，學術界也沒有人附和。王獻唐先

^① 顧頤剛：《史林雜識》初編，中華書局，1963年，第180、183頁。

^② 劉起鈞：《古史續編》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1997年，第121-122頁。

^③ 有一次楊先生和我閒聊，他說他的顧老師（頤剛）是一流學者，錢老師（賓四）是三流學者，郭沫若可以說是超一流學者。吳銳謹按：楊先生對錢穆的評價不公，近年我提出“石泉學派”，認爲錢穆是石泉學派的先驅，非常了不起。見《中國古典學》第一卷序言。

生不僅反對天鼉的釋讀，而且認為即使是天鼉，應屬姜姓而不是姬姓^①。楊先生則稱贊天鼉是最好的解釋，認為出自天鼉即出自軒轅，而軒轅即黃帝，也就是姬氏出自黃帝。而黃帝之稱作“軒轅”（天鼉）實在是水族動物龜蛇的崇拜。2004年，我第一次到臺灣，就抓緊到臺北故宮博物院近距離觀察《獻侯鼎》，確信楊先生對郭沫若的發揮是極為重要的。《金文編》所收多例圖像，古文字學家自來無解，楊先生首次釋出這是“玄鼉”二字的合文。禹為勾龍，這是顧頤剛先生在古史辨運動初期提出并引起軒然大波的論點，童書業先生《九州之戎與戎禹·跋》又申論之，指出勾龍實為本族之龍蛇崇拜。禹父鯀，《說文》作“鯀”，段注以為“禹父之字古多作鯀作𩚑”，而不收“鯀”字，楊先生認為其實應作“鯀”或“𩚑”，從“玄”者亦象徵本族之圖騰。夏姓姁，“以”字篆文作，亦像盤蛇形，都可以說明夏族之以龍蛇為圖騰^②。總之，黃帝、夏、周之圖騰雖幾經變化，而實可斷為同一系統，同一族類。

但楊先生進而說中國人都是炎黃子孫，則斷然錯誤。即以楊先生自己的研究而言，他肯定東夷的貢獻，東夷最大支系是鳥夷，顧名思義是崇拜鳥的，古書往往被篡改為“島夷”。對鳥夷族系的研究，應作為古史辨派上古史體系的重要內容^③。顧頤剛先生最初主張殷人起源於陝西，這是清人俞正燮等人主張過的。晚年治鳥夷史，“頓覺商人為東方民族。”完成了八萬八千字的長文^④。典籍常見虞、夏、商、周四代并提，虞代（舜）、商朝和後來秦朝的創立者都是鳥夷族^⑤，這一大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。

與黃帝休戚與共的是炎帝，傳說炎帝是姜姓。顧頤剛先生考證姜族原居地在四岳，為西方萃聚之四山，在陝西、甘肅交界一帶^⑥。楊先生認為炎帝的圖騰是熊，《九歌》之“焉有虬龍，負熊以游”，楊先生認為虬龍是夏族的圖騰，而熊是羌族的圖騰，兩族融合後，互為族外婚而親密無間，他們的宗神也水乳交融，而“虬龍負熊”了^⑦。《周禮·春官·司常》記載司常的職掌是掌管旗幟，“日月為

^① 王獻唐《山東古國考》，齊魯書社，1983年，第78頁。

^② 楊向奎《宗周社會與禮樂文明》（修訂本），人民出版社，1997年，第37-38頁。

^③ 以古史辨派為天敵的“走出疑古時代”的代表人物、前中國社科院歷史所李學勤所長認為是“島夷”，并引良渚文化作證，筆者已作反駁，見拙作《從“島夷”論談考古與文獻的對應——學習第十三批判筆記之三》，《古史考》第六卷，海南出版社，2003年。

^④ 顧頤剛《鳥夷族的圖騰崇拜及其氏族集團的興亡——周公東征史事考證四之七》及王煦華先生後記，《古史考》第六卷。

^⑤ 前引顧頤剛先生長文及本書拙作《試論中國古典學和四夷古典學》。

^⑥ 見顧頤剛《史林雜識》初編附“四岳與五岳”地圖。

^⑦ 楊向奎《宗周社會與禮樂文明》（修訂本），人民出版社，1997年，第39頁。

常，交龍爲旗，通帛爲旟，雜帛爲物，熊虎爲旗，鳥隼爲旟，龜蛇爲旐，全羽爲旟，析羽爲旐。”又，《周禮·冬官·輅人》：“龍旗九旐，以象大火也；鳥旗七旐，以象鶉火也；熊旗大旐，以象伐也；龜蛇四旐，以象營室也。”自來注家多以四方旗幟作解，楊先生首次用圖騰作解釋，認爲說明了華夏部族在階級社會前之圖騰制度：“龍旗九旐”及“龜蛇四旐”，本爲夏周之圖騰，有姬之出自天龍，即龜蛇崇拜，而夏之姒姓實即龍蛇。夏周一系都是以龍蛇爲圖騰。而“鳥旗七旐”，爲殷商東夷之圖騰。熊則爲姜氏圖騰，而姜與姬合并爲周族，故華夏族圖騰亦引進熊虎，黃帝軒轅亦號有熊，而鯀、禹都有化爲黃熊的傳說。黃熊與龍蛇合爲夏族，故《天問》有“焉有虬龍，負熊以游”！龍而負熊，蓋象徵兩族之合，更有鳥旗，則東夷與夏周合而華夏族形成^①。

鳥夷族的圖騰是鳥，不僅《詩經》有明文，而且得到甲骨文、金文的印證^②，也是楊先生同意的，華夏族融合了一部分東夷也是可信的，但不能因此而取消了東夷各族。我們不要忘記，西周建國不久，東方不服，群起造反，周公東征三年，血腥鎮壓，把東方各原住民打得四處逃竄，這是楊先生的顧老師晚年研究的大課題，光芒萬丈。戰國時代叱咤風雲的秦族、趙族就是在這時被迫西遷的。居住在現今山東的徐族則被迫南遷到江、漢及淮河流域。經過周公對東方的大清場，西周才得以分封齊、魯諸國。華夏族是最信奉“非我族類，其心必異”^③的，有可能融合大量東夷嗎？那是不可能的事。

鳥既與天龍無關，又與熊無關，那麼鳥夷就不可能是黃帝子孫，也不可能是炎帝子孫。現在大陸的所有媒體無不時刻在宣傳中國人是炎黃子孫或黃帝子孫，其實都可以以鳥夷爲例駁倒，其它證據不可勝數。比如周族雖然征服了殷族，建立西周（公元前 1027—前 771 年），但不得不承認殷族“有冊有典”，“殷字”必然是用來記錄殷族的語言，才能變成殷族的典冊，後世所謂“漢字”與“殷字”一脈相承，可見“漢字”絕非漢族的發明，應該正名爲“殷字”。漢語追溯其源頭，必然是“殷語”。秦始皇“書同文”，對“殷字”進行了大整頓，秦族也是鳥夷族。

我主張創造上古文明的大的主要族系可區分爲三大系：

炎黃系——炎帝族系：炎帝—齊許申呂。黃帝族系：黃帝—夏—周。

鳥夷系——唐（堯）—虞（舜）—商—秦。

昆侖系——羌族，楚族，巴族等。

即使是炎帝族系，與黃帝族系通婚結盟的畢竟是少數，剩下的就成爲羌族。可見能被炎黃系接納的人數必然很少。因此中國人就絕不可能是“炎黃子孫”。

^① 楊向奎《孫詒讓 籀廬學案》，收入楊向奎《清儒學案新編》第五卷，齊魯書社，1994 年。

^② 河南花園莊 20 世紀 90 年代新出甲骨文有，传世青铜器有，均为“玄鸟”二字合文。

^③ 《左傳·成公四年》。

楊先生對中國族系的研究有很多閃光點，但總體上不如顧頡剛先生宏大。顧先生要打倒四個偶像：帝系、王制、道統、經學，尤其是黃帝一元論，這是何等的高瞻遠矚！而楊先生背離了老師的正確道路，退回到“楊守”（先生筆名），這還可以從他的經學研究顯露出來。

顧名思義，“經學”是研究古代經書的一門學問。我國的經書由最初的五種（《詩》《書》《禮》《易》《春秋》）演變到“十三經”，儒家認為裏面包含着宇宙間一切真理，是大學問，而幫助理解經學的文字訓詁功夫，是小學問，就叫小學。楊先生在北大讀書時與張政烺先生友善，他們二位當時就被認為是研究經學的。抗戰時期，顧頡剛先生還與楊先生通信討論經學研究計劃。1945年，楊先生將前兩年寫的講義出版，書名是《西漢經學與政治》，對當時指控劉歆偽造古書的風氣駁正較多，受到顧頡剛、傅斯年、董作賓等先生的好評。1949年後，大陸研究公羊學的幾乎絕迹。1978年，吉林省社會科學院請楊先生去講《公羊春秋》，1988年寫成專書，1989年出版，書名叫《大一統與儒家思想》，內容從先秦貫通到康有為、古史辨派。先生認為，《公羊》學派最主要的理論是“大一統”，先秦公羊學本來是新興地主階級思想意識的反映，而新興地主階級和過去的宗法貴族有千絲萬縷的關係，因此公羊學派的歷史哲學能向前看，但有時回顧，未免徘徊於兩者間，法後王而好古。西漢社會所創造的現實，適當地解決了公羊學派的矛盾觀點，這時實現了他們想望的大一統，而今文學派也取得了經師中的正統地位。東漢社會發展到一個更新的階段，世族地主出現了，新興力量變作舊的堡壘，原來公羊所鼓吹的“大一統”，有被拋棄的危險了，因為世族豪門都是割據諸侯的候補者。《白虎通》的出現，使公羊學走上背叛自己的路。於是早期公羊學處於日暮途窮的境地，何休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作《公羊春秋》義法的總結，這總結脫離了當時的社會實際，因而祇能是書面上的總結，無現實意義。不過他究竟保存了公羊學派的精華，這是在我國古代少有的歷史哲學，在後來的長期封建社會內，當地主階級無路的時候，他們又想到公羊，想到何休。

楊先生認為《公羊》義法之變始於《白虎通》，它反映了豪門地主階級的强大而企圖削弱天子的地位，天子不是一尊，天下并非一家之有，如《三正》篇云：

王者所以存二王之後，何也？所以尊先王，通天子之三統也。明天子非一家之有，謹敬謙讓之至也。

楊先生解釋說：王者存二王之後，與本朝為三，所以通三統，是《公羊》古義，但“明天下非一家之有”，却是新說，傳統儒家及古經典都是說“溥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濱，莫非王臣”。如今却說“天下非一家之有”，是公開主張分裂，是反映當時豪門世族政治要求，“幾人稱帝，幾人稱王”的局面呼之欲出了。《白虎通》不循《公羊》原有義，在走回頭路。天子不尊，於是諸侯對於天子有“不純臣”之義：“王者不純臣諸侯何？尊重之，以其列土傳子孫，世世稱君，南

面而治……異於群臣也。”楊先生認為在東漢並不存在強大的諸侯，在當時具有強大實力者不是這些名義上的諸侯，而是豪門世族，後來取得割據地位的正是他們。《白虎通》在遷就他們而貶低天子，也不倡大一統^①。

在楊先生看來，《白虎通》簡直犯了“分裂國家”罪，是應當痛加斥責的。其實在我看來，這恰恰是《白虎通》的精華所在。早在西周，統治者承認天命是不斷改易的，因此政權也會輪替，不會一勞永逸。春秋時代，也沒有江山萬代傳的觀念。如周靈王的兒子太子晉就曾對他的兄弟周景王說：“夫亡者豈繫無寵？皆黃、炎之後也。”意思是說黃帝、炎帝的貴胄，也有身敗名裂的。相反，“此一王四伯，豈繫多寵？皆亡王之後也。”“一王”指的是禹，“四伯”指的是四岳。禹的父親鯀治水不力，被上帝殺了；四岳的祖先共工壅防百川，天怒人怨，導致滅亡。可是失敗的鯀並沒有影響他的兒子禹成功建立夏朝，滅亡的共工也沒有影響他的後代成為禹的左膀右臂。“若啓先王之遺訓，省其典圖刑法，而觀其廢興者，皆可知也。其興者，必有夏、呂之功焉；其廢者，必有共、鯀之敗焉。”^②秦始皇不信邪，他要當始皇帝（第一個皇帝），子子孫孫傳之無窮，沒想到十五年就滅亡了。西漢傳到成帝手裏，劉向以宗室的身份在朝廷擔任要職，毫不掩飾地對皇帝說：漢室快要亡了！“自古及今，未有不亡之國也！”同時的谷永也說“天下乃天下之天下，非一人之天下！”這是古已有之的思想，楊先生偏偏說是東漢才出現的“新說”；這是何等光輝的民主思想，在楊先生看來却是“分裂”！

《春秋》本有“內諸夏而外夷狄”的思想，《公羊傳》加以繼承，在兩漢得到運用。如西漢宣帝時，匈奴呼韓邪單於來朝，皇帝讓大臣討論接待的規格，最後將匈奴定位為“敵國”（平起平坐之國），以“客禮”相待，說明漢朝並不追求將匈奴納入王土進行直屬管轄，對匈奴是敬而遠之。東漢班固在《漢書》卷94下《匈奴傳》之末趁機發表了他對聖王制御蠻夷的方法：《春秋》內諸夏而外夷狄。夷狄之人貪而好利，被髮左衽，人面獸心，與中國殊章服，異習俗，飲食不同，言語不通，因此聖王禽獸畜之，不與約誓，不就攻伐。夷狄之人人面獸心，夷狄之地又榨不出什麼油水，不值得拿過來。

到了東漢，章帝在建初四年（公元79年）召開了一次御前會議，由班固記錄整理成《白虎通義》一書，其中《禮樂》篇說：“何以名為蠻夷？曰：聖人本不治外國。”可見直到東漢是將蠻夷當作外國對待的。順帝永和元年（公元136年），武陵太守上書，認為蠻夷率服，可比漢人，增其租賦。議者皆以為可，祇有尚書令虞詡反對，他說：“自古聖王不臣異俗，非德不能及，威不能加，知其獸心貪婪，難率以禮。是故羈縻而綏撫之，附則受而不逆，叛則棄而不追。先帝舊典，貢稅

^① 以上參見楊向奎《大一統與儒家思想》，中國友誼出版社，1989年，第103-109頁。

^② 《國語·周語下》。

多少，所由來久矣。今猥增之，必有怨叛。計其所得，不償所費，必有後悔。”順帝不從，果然引起澧中、涑中蠻的反叛^①。“聖人本不治外國”“聖王不臣異俗”是從《春秋》內諸夏而外夷狄衍生出來的光輝思想，可以說是儒家原教旨主義，與分不分裂沒有關係。說《白虎通》“反映當時豪門世族政治要求”更是上綱上線，中國至今仍然在大批特批普世價值，單是我們《中國社會科學院報》就整版整版地登載，也是基於這種立場。楊先生 1950 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，自然要運用這種階級分析法。

楊先生對郭沫若推崇備至，一是認同唯物主義，二是佩服郭沫若的古文字天才。顧頡剛先生是研究文獻的劃時代大師，注意力不在古文字上。他的學生胡厚宣幫助提供甲骨文材料，他的朋友陳夢家爲他提供金文材料，因此顧先生的長篇大論不僅在結構上、文筆上是精雕細琢的藝術品，而且各種材料也是網羅無遺，這幾種上乘功夫都是前無古人的，當代無人能與之比肩。楊先生因爲特別重視古文字，所以常常有驚人的發現，例如將甲骨文之“不𠄎”釋讀爲“不玄冥”，將金文之“𠄎”釋讀爲“玄龜”，我認爲都是絕妙的釋讀。他甚至獨孤求敗，也不放棄。例如《尚書·洛誥》有“明保”一詞，又見於西周初年銅器《令彝》和《鬲卣》。現代學者一般認爲“明保”是周公的兒子，祇有楊先生獨樹一幟，認爲明保即周公。學術界通常以“甚至有人認爲明保即周公”來表達對楊說的怪异。本人於 1994—2000 年給楊先生當助手，他要我考慮這一問題，我以爲楊說可以成立，祇是我以爲“明保”即神保，而楊先生認爲“明”即天明，正好可以照應周公的名——“旦”。《說文》，“旦，明也”。2008 年 5 月 27 至 29 日，臺灣佛光大學舉辦第一屆世界漢學中的《史記》學國際學術研討會，筆者赴會并提交論文《〈史記〉所記太公、周公、召公與金文的比對》^②，即發揮上述觀點。學術界一看見帶“保”字的青銅器，就認爲是召公，其實周公也可稱“保”。拙文進而猜想，西周存在大祭司和國王兩套權力系統，類似當今伊朗宗教領袖和總統的關係。太公可能是武王王朝的大祭司，周公可能是成王王朝的大祭司，召公可能是成王、康王王朝的大祭司。大祭司由於握有重權，故能在非常時期攝政當國，周公是也。“保”並非專指召公，周公作爲大祭司，故稱“明保”，“明保”等於說神保、靈保、天保、聖保。

周公、召公不僅有“保”的糾葛，而且還有分陝而治的說法。《史記》卷 34《燕召公世家》：“其在成王時，召王爲三公：自陝以西，召公主之；自陝以東，周公主之。”《集解》引何休曰：“陝者，蓋今弘農陝縣是也。”司馬遷是西漢人，何休是東漢人，可見周公、召公分陝而治說法在兩漢的盛行。在南朝，統治中心雖然在揚州，但荊州居長江上游，地位凸顯，正史經常將荊州、揚州的關係比作

^① 《後漢書》卷 86《南蠻西南夷列傳》，《後漢書》第十冊，中華書局，1965 年，第 2833 頁。

^② 收入拙編《中國古典學》第一卷，海南出版社，2008 年，第 513—537 頁。

周公、召公分陝。但據《公羊傳·釋文》保留的一種說法，“陝”一作“邲”，即邲鄩，在洛陽。按照這種說法，周公、召公是以洛陽爲界東西分治。

楊先生曾經提醒我，召公名奭，此字在甲骨文已經出現，是一種衣飾——蔽膝，引伸有輔弼之意。周召分陝而治的說法是周召分夾而治的訛傳。“夾”是動詞，即夾輔之義，不是洛陽之邲鄩。多年來，我考慮這一問題，又有意外的收獲。

在今河南省東部、北與山西省交界有地名陝縣，位於黃河中游，東經 111.1 度，北緯 34.7 度。周人發祥於黃河最大支流渭水之岐山，岐山是周族的神秘宇宙中心。隨着西周建國，統治區域大大擴大，雒邑爲宇宙中心的說法更占上風，於是周人汲汲於營造雒邑，把雒邑作爲東都。如果把周人發祥的渭水流域作爲周族的“老區”，那麼雒邑及其以東則是國家的“新區”，對“老區”和“新區”分開統治是有可能的，但在現存文獻找不到任何證據。但是“中華人民共和國”這一國名中的“共和”二字就是取自周公、召公共和治國的美談，“共和”一詞就有分治的意思。通盤考察中國歷朝歷代，筆者認爲今河南省陝縣所在的東經 111 度是一條重要的民族和文化分界綫，西部是原住民（少數民族）聚居區，東部是漢族聚居區，應當東西分治，依據就是 2007 年 9 月第 61 屆聯合國大會通過的《土著人民權利宣言》，中國是簽字國之一。

古籍屢見夷漢、夷晉、宋夷并列，漢、晉、宋祇是朝代名，不是民族名。學術界將朝代名誤爲民族名，進而認爲漢族形成於漢朝，將漢族歷史大大拉長。清末將內憂外患歸結爲四萬萬“皇漢民族”與五百萬“異種賤族”之滿族的不共戴天，這“四億”漢族人口空前膨脹，可以說是以革命的名義偽造。其實漢族未必是中國的主體民族。我主張 21 世紀中國史學的突破在於民族史，中國歷史上最大的疑案莫過於漢族人口之謎。漢族是一個混合民族，舉世公認，我認爲漢族應當一分爲二：信仰儒教的是漢族，不信仰儒教的可組合爲新族。見拙作《試論中國古典學和四夷古典學》，已收入本書。

總之，楊向奎先生作爲蓋棺定論的史學界一代宗師，學術貢獻是多方面的，以上祇是略舉數例而已。

三、追尋楊先生在甘肅抗戰的足跡

楊先生雖然出生於富裕家庭，但由於遭逢亂世。他曾經對我說，他的老同學胡厚宣坐着飛機去買甲骨，而他潦倒到沒有飯吃的地步，因而才於 1938 年到甘肅投奔顧頡剛先生。

顧頤剛先生寫於民國廿六年十一月《皋蘭讀書記》^①：“自九一八事變後，……縣創辦三戶書社與燕京大學教職員抗日會中；其後青年紛至，非學校團體所能容，遂別創通俗讀物編刊社與城內，……及七七事變起，……日人提出（媾和）條件，通緝抗日分子居其一，抗日分子又以予居首，予遂不得不出走，走至甘肅。……（臨洮）教育廳長葛武榮^②……復以通俗讀物編刊社中出有《平型關大戰》諸書，為共產黨張目，控予於國民黨中央政府，予避其鋒，西行至渭源、臨潭、卓尼、拉卜楞、河州諸地……”張書城先生《顧頤剛在渭源》一文^③寫道：“我國‘古史辨’學派創始人顧頤剛先生曾於1938年2月，帶着他的高足王樹民、楊向奎等先生到渭源考察教育。”“顧先生離開渭源之前，應張校校董馮筱軒之請，曾撥出‘庚款’一千元支援私立張氏小學。又應教育局長張嘉民之請，以‘庚款’在北關張校辦了一期師資訓練班。更可貴的是，他還留下他的高足楊向奎、趙國雋、徐耀庭、金素蘭等在師訓班和張校任教。特別是楊向奎先生又‘受顧師之囑’，特意給師訓班寫了部《鄉土教材》，結合渭源名勝古迹、風土人情，進行愛家鄉、愛祖國的教育。”顧先生一行在渭源的活動，張書城先生是親歷者，故能保留以上實錄。

據楊先生自己回憶：1937年“七七事變”後從日本回國，10月到長沙，當時北京大學、清華大學、南開大學在長沙成立西南聯合大學，不久要南遷昆明，而楊先生還沒有職業，於是到了西安，準備找八路軍辦事處，但没有找到，遇到北大同學李夢英，告知顧頤剛先生在蘭州，楊先生於1937年12月下旬買汽車票去蘭州，1938年1月2日到達。1月4日隨顧先生到臨洮辦小學師資講習班，以後又到渭源辦講習班，一直給講習班上課。5月由顧先生介紹去蘭州甘肅學院文史系當講師，7月被甘肅學院聘為教授，時年28歲。在甘肅教了兩年半書，1940年2月初，楊先生去了成都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^④。顧先生時任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主任。顧潮《顧頤剛年譜》是根據顧先生日記編著的，有如下記載：

1938年1月，王樹民、楊向奎避亂至蘭州，顧先生邀他們一起去臨洮。2月10日抵渭源。2月24日，顧先生離開渭源，留下楊先生辦師資班。4月21日，顧先生再來渭源：“向奎見予，謂別來兩月，老了五年。”

^① 顧洪編：《顧頤剛讀書筆記》第四卷，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，1990年，第1949頁。吳銳案：皋蘭，甘肅縣名，位於蘭州市北。

^② 2006年10月我到山東大學參加紀念《古史辨》第一冊出版八十年會議，見到一篇論文，考證顧先生讀書筆記“如予不遭葛氏之攻擊”之葛氏是傅斯年，“糾葛者，束縛也；縛，傅也。”還反唇相譏，說“這是顧先生考證‘禹’的手法。”。這位先生因為一心要抬“走出疑古”的轎子，故有上述哭笑不得的考證，其實顧先生所說的葛氏即葛武榮。

^③ http://www.lzrb.cn/rb/2004-10/27/content_137671.htm。

^④ 李尚英《楊向奎學述》，浙江人民出版社，第34-35、232頁。

8月2日，住甘肅學院楊向奎處，“渠初由渭源來此任教。”

1939年12月25日，致楊向奎信，論經學清理工作。

1940年2月初，楊向奎自甘肅辭職來投，顧先生時任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主任^①。

時逢我主持研究所一個重點課題“《禹貢》學術史”，需要到西北考察歷史地理。同時我也想在楊先生百年冥誕之際，沿着楊先生的足跡，做一次朝聖之旅。

2009年7月13日下午，我坐火車從北京出發，14日一早到西安，立即看望石興邦、劉士義、劉寶才老師。下午尋找南院門古舊書店，已經搬遷到西大街界面，十八年前，我是它的常客，現在發現它存書很少。現在盜版猖獗，古書業最受打擊。晚上與到南門護城河聽群眾唱秦腔。15日游法門寺、乾陵、永泰公主墓，本想到山下的渭河邊走一走的，沒有了時間。我在以前的多種著作中，都推崇渭河是炎黃系的發祥地。現在官方動不動就說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搖籃，這種說法很不準確。黃河那麼長，族系復雜，不可能是某一個民族的搖籃。而且“中華民族”到底是什麼民族？古書上沒有任何證據。16日游西安音樂學院，十八年前我在這學二胡不成，學阮又不成，此後乾脆沒有碰過樂器。晚上到新城廣場一個劇院看陝北民歌演出。17日晚，坐火車往蘭州，18日一早到達，到西北書城買花兒方面的書和光盤，一無所獲。在張掖路新華書店買到蘇平光盤一張。下午到黃河邊聽歌，唱花兒的同時有三波：一是男女對唱，男方是回族。看來是即興編詞，方言聽不懂，聽衆多為回族。二是四把二胡伴奏，有三四個人演唱，都是已有的花兒。三是有位老者用小錄音機放花兒，獨唱了幾首，引來其它人獨唱，直至男女對唱。花兒是西北下層民衆喜愛的民歌，中上層自認為“先進於禮樂”，不屑於唱。我在《中國古典學》第一卷第八章認為“應該列為中國民歌之首”。黃河邊唱秦腔、豫劇的更多，聽衆上千人。我真希望中央宣傳部、文化部的官員能夠到黃河邊走走，多為老百姓的文化生活做些實事。

7月19日，一早坐汽車，往西南155公里，中午到達臨夏回族自治州首府臨夏市。下午三點到王尚書墓園見王沛先生。他是明朝正統年間兵部尚書王竑（1413—1488）第19代孫。王竑是江夏人，辭官在此居住，死後即埋葬此處，墓園尚存，是自治州文物單位。其實像這樣的明朝遺迹應當定為省級文物單位。王沛先生畢業於天津音樂學院，是研究花兒的大權威（我認為是研究得最好的專家），現供職於臨夏自治州文化館。我們相談甚歡。回來後參觀香匠莊清真寺，上書“開天古教”四字。晚上與著名東鄉族花兒歌手何清祥先生見面。花兒有河州型花兒和洮岷型花兒之分，臨夏市是河州型花兒的重要發源地，可是沒有任何花兒的氣氛，遠不如青海。

^① 顧潮《顧頤剛年譜》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1993年，第282—297頁。

7月20日，零星小雨，坐汽車到夏河縣參觀藏傳佛教聖地拉卜楞寺。在一家音像店見到一個小喇嘛買喬丹光盤，問他，叫洛桑英派，13歲。藏族人以家族有出家人為榮，非漢族所能理解。21日一早參觀臨夏自治州博物館，藏品豐富，還不要門票。這些文物我在書本上都研究過多次，但看實物的感覺就是不一樣。如積石山縣出土的馬家窑類型弧綫紋彩陶瓶，有仰韶文化重建的花瓣紋和弧綫三角紋。因此手繪下這個紋飾。辛店文化羊頭紋飾下不是十字架，而是×。銅石并用時期的玉器有玉鏞、玉鉞、玉璧。其中一件玉琮，兩頭圓，中間方。看完後十點鐘坐汽車往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縣進發，一半路程是土路。從日月山翻過大山進入循化，出現水泥路。山雖然很大，但坡度不太陡峭。沿途都是大牧場，可以看出土層很厚，好像是黑土，顯得很肥沃的樣子。有一首花兒叫《想起尕妹拉夜川》就是這麼唱的：“藏民們占下的好草山”。在一高山的公路坎上出現法輪功的特有標語。從道幃藏族鄉到白莊鄉，出現黃土高原景觀。到達循化縣城住下後，立即開始考察黃河，徒步5小時。黃河在循化段很清澈，河谷較寬，兩岸為高大的黃土山，十分壯觀，好似長江三峽。有的山體寸草不生，好似經過雕刻，非常好看。河南即縣城所在，河北則在開發旅游。循化有如此壯觀的旅游資源，看來宣傳不夠。《尚書》裏有一篇《禹貢》，是中國最早的地理著作，其中講到大禹“導河積石，至於龍門”，臨夏自治州有積石縣（民國叫導河縣），循化縣城的主街叫積石大道，均取義於《禹貢》。

7月22日，坐三個多小時到達西寧市，轉中巴到達互助土族自治縣，下車後找花兒茶園，聽了三小時，一打聽才知道是頂尖花兒歌手張存秀（漢族）的妹妹張生秀所開，隨後到幺麻姚家大院看土族歌舞和輪子秋。23日回西寧，買到四十張花兒光盤。24日在青海社會科學院演講《西部文明的重新定位對化解中國民族問題的啓示》。我認為西部有它固有的燦爛文明，不需要拿儒家作文明的參照點，因此需要重新定位。下午沿湟水步行，不覺來到土樓觀，遂買票上山，一直爬到山頂。前面有一塔，可能即北禪寺。

7月25日八點，來到南山公園，十點半開始零星小雨。12點，第六屆西北五省大型民歌演唱會開始。與張存秀的兒子趙繼軍見面，並與張存秀合影。青海花兒研究會秘書長張翔邀請我到大通縣出席花兒研討會，遂中途下山，與青海花兒研究會滕曉天會長、井石副會長、張翔秘書長雨中到達大通。研討會上，承馬得林前輩（回族）贈送他著的《新編大傳花兒》。他是位鄉村教師，已經被政府列為花兒傳承人。晚飯時咎萬億、童秀英、向國安、馬得林現場演唱了幾首花兒。咎萬億是土族，也是頂尖花兒歌手。26日八點，零星小雨，打車到西山公園，武警凶悍地不讓出租車進入，游人要買票，3元，却不給發票。以往這類花兒會都是老百姓自發的，現在政府圈起來賣門票。我爬到山頂，尋訪明代長城。系土築，現在被挖得祇剩下又窄又矮的殘迹。11點20分，花兒演唱會開始。歌手有王秀、